

警惕市场对于高校的误导

Guard against Market Leading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stray

宓洽群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确立后,高教界进入了新一轮的改革,在确立高校的法人地位,改变政府的管理职能,培育人才和技术市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由面向政府、面向计划、奉命办学,转向面向社会、面向市场、自主办学。可以预计,经过若干年后,一个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办学体制终将在我国高等学校中建立起来。

然而,不无忧虑的是,由于宏观调控的不得力、不到位,在相当一部分高校中出现了一些接受市场误导的迹象,影响了高校主要功能的发挥,威胁到国家长远目标的实现。对此应有所警惕,有所剖析,以便采取措施,加以拨正。

一、出现了以“副业”挤“主业”的苗头

众所周知,高校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为主要功能,这是国家兴办高等学校的根本目的。至于直接为社会提供服务,包括从教学、科研延伸出去的工作,则只能在发挥学校优势,结合教学科研,至少在不损害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这两项“主业”的前提下进行。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校园里兴起的“三产热”、“第二职业热”和“经商热”则是有违这些前提的。

一是在兴办科技产业上,鉴于最终产品销售的利润远高于技术成果转让的收益,就不顾产学研分工和学校条件,一窝蜂地办起技工贸一条龙的经营实体。仪器系设立仪器营销门市部,药学院办起医药公司,摊子越铺越大,领导精力越来越从办学主体上分散开来。我们并不笼统地否定技工贸一体化。在高技术领域,学校理应承担起孵化产品以至产业的任务。问题是高校的科研人员不宜越俎代庖,卷入中试以后大量的工程性工作,从而影响本职。

二是在集资办学与改善教职工待遇上,鉴于第三产业见效快,获利大,竞相兴办餐饮业、旅馆业,

甚至挤出巨额资金,染指证券、房地产买卖。有的工科院校,校园内同时挂起三个出租汽车公司的招牌;有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办起了灯红酒绿的卡拉OK和舞厅。所有这些行当与高校的科技成果和人才优势风马牛不相及,与高校的校园文化也格格不入。

三是经商风和“第二职业热”再次刮进校园,师生员工中涌现一批掮客(时下叫“经纪人”);布告栏上贴满了各种商品信息,从羊毛衫到取暖器,从大哥大到BP机……工会、团委都上阵,教师学生齐“下海”。

就这样,从产学研分工合作搞科技成果的转化,发展到学校独家在新产品开发上包打天下;从谋求后勤社会化以集中领导精力于办学主体,发展到铺开摊子办三产,办社会;从控制教职工搞“第二职业”、劝阻学生经商,发展到师生员工齐下“海”。领导的重心、教师的精力、学生的热点也就日益偏离教学、学习和科研。一些高校的教师反映,近来校系两级领导考虑教学工作和学科建设越来越少,甚至连搞基础性研究的学科带头人也不得不分出相当精力,搞点短平快产品,以津贴研究生,填补菜篮子。有的学生人在课堂心向市场,怎么读得进书?

二、以“副”挤“主”与市场经济的主旨南辕北辙

高校中的上述动向,由于它反映了市场导向,被一些同志认为是“适应市场经济”之举。他们说,国家既然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培育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学校何乐而不为?高校人浮于事,编余人员又难以调出,正好交三产吸纳,学生课余做点买卖,懂得点生意经,洗刷点书卷气,日后岂不更有出息?

这种看法不仅低估了目前高校中业已出现的以“副”挤“主”的后果,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意也是南辕北辙的。市场经济旨在通过社会

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保证社会分工的实现,而社会的专业分工越精细,生产力就越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之所以比自然经济发达,关键就在于从自给自足走向了高度的社会分工。而今,一说适应市场经济,就不分工农兵学商,三百六十行人人都下“海”,行行都经商,岂不是社会分工的倒退,自然经济的复归,从根本上违背了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本意!当然,这中间并不否定在人员确有富余又一时难以外流,领导成员和骨干队伍确能统筹兼顾、扬长分流而不影响教学科研的条件下,可以适度兴办一些符合产业政策而又为学校所需的服务性产业,借以聊补教育经费和教职工收入之不足。问题是这些条件说来容易,实际上往往难以具备。拿领导班子来说,面对经营产业这个陌生的行当,面对关系到全校教职工收入水平的大事,肯定要挤出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再拿教师队伍来说,在科技产业上,下海抓中试生产—产品营销的往往就是这方面的学术骨干,分流谈何容易。因而实际上一些高校的做法不得不脱离这些前提,超越这个“度”,以致以“主”挤“副”,得不偿失。

三、接受市场误导的根子在于资源流向高校的渠道很不通畅

工农兵学商,三百六十行,本来都可以凭自己对社会提供的劳务,为社会所作的贡献,收取相应的报酬,得到等价的补偿。从而形成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各安本业,各得其所的和谐而又高效的社会结构。拿大学里的教师来说,就是凭自己提供的教学劳务和作出的科技成果向学生收取学费,向企业收取成果转让费赖以营生的。当然,由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不仅给家庭和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还推动着社会进步和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综合国力的提高,国家作为全民长远利益的代表者必然要从税收中拨出足够的资金投向高教。

就这样,学费、科技成果转让费,以及各级政府的高教拨款便构成了社会资源流向高等学校的三条主要渠道。然而遗憾的是,在目前的体制弊端下,这些渠道几乎都处于被阻塞或不甚通畅的状况。

首先,建国以来,高等教育被超阶段地视为一种社会福利;上大学不缴学费,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阻塞了千家万户流向高校的智力投资。这种体制在多数劳动家庭不得温饱的年代里尚情有可原,今天则成了高等学校“贫血”的人为障碍。

其次,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缺乏技术进步的的动力和压力,缺乏风险投资和中试条件,难以吸纳科技成果并使之转化为产品和商品,遂使技术成果

的市场价格大大低于它包含的价值,补偿不了高校技术开发的投入。

最后,国家成了一千多所高校办学费用的唯一支付者。终因不堪负担,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高校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所谓“入不敷出”,一是按学生人头拨发的教育事业费标准过低,不够偿付人才培养的成本;二是政府用来养基础研究、高技术开发,以及对国家的兴衰安危、发展后劲紧密相关的重点攻关项目的各项基金和“纵向科研经费”杯水车薪。与发达国家比,只是一个零头;与国内由于消化吸收不力,在重复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上浪费掉的资金相比,也微不足道。80年代末,上海市在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等十四项重点工业项目会战攻关中,有一年只能拿出3000万元科技攻关费,当时的市长还一再关照各路科技大军,要精打细算地用,不要狮子大开口,争吃“唐僧肉”。由于“纵不如横”(纵向科研经费不如横向科研经费充裕),入不敷出,有的项目完成时,设备破败了,人员累病了,再也没有能力承担这类任务了。

去年以来,为了缓解高校经费的短缺,国家教委终于允许高校招收一定比例的自费生和委培生,又因顾虑家庭承受能力,在名额上和金额上作了种种限制。其实,学校收费属于建设性的智力投资和良性的资源流动。然而物价部门对它的监督往往比对形形色色的公款旅游和大吃大喝严格得多,使这一集资渠道半开犹闭。为了提高科技成果的市场价格,国家正在从经营机制上激发大中型企业的技术需求,从政策上鼓励其技改投入,而这在短期内也难见大效,对解决高校技术开发资金的“近渴”来说,只能算是一股“远水”。于是人们把目光盯向政府的高教管理部门,希望能多得到一点国家的教育拨款,以冲抵物价的上涨,抵挡社会上相关行业特别是三资企业提高工资待遇对稳定高校教职工的冲击。然而,政府的回答是,国家也有难处,劝大家“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要求大家通过兴办各种各样的校办产业,大幅度地提高预算外收入,以求得相当大一个比例上的自养。这样,一所高校教职工的收入水平就相当程度上决定于该校校办产业的盈利,而不再主要地取决于教学科研水平的高低与贡献。而在学校内部,也必定要让那些直接为学校创收的人先富起来,尽管他们的教学科研水平不如学术骨干。而这正是高校上下接受市场误导,出现以“副”挤“主”倾向的根本原因。

四、加强宏观调控,使高校能安于主业,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以“副”挤“主”尽管被某些高校领导人嘲解为“曲线兴校”,它对于基础研究、学科建设、教师队

伍、教风学风所带来的后遗症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于是有人就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高校是否不可逾越地要进入这条欲进先退的弯弯道？笔者认为，未必。因为综观亚洲几个新兴国家近30年来教育兴国的历史，基本上都没有因为政府财力的拮据，使高校在办学中出现被国内某些校长喻为“逼良为娼”的痛苦局面。社会主义国家能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市场进行更为自觉的调控，怎能长时间地容忍市场对高校办学行为的误导和扭曲？

在此，有必要对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再作一番探讨。经济学界认为：“市场”与“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国家干预和市场的结合才能形成市场经济。市场越发达，国家干预越是重要。市场的原则是利润，而市场经济的原则则是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家持续的繁荣和进步。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将导致二元的、甚至是四分五裂的社会，它不仅会埋葬市场经济，还会使赖以立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趋于崩溃。

现实市场之所以会把高校导向损害国家长远利益的方向，是因为它在国家调控乏力的情况下，存在着明显的“三个不等价”：其一，高校的教学劳务与学生支付的学费不等价；其二，高校的科技成果包含的价值与企业支付的转让费不等价；其三，学校向国家提供的后效性科学文化成果与国家的

教育投资和下拨基金不等价。这就在高校中出现了曾经在我国农村中广泛流行过的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过低而导致的“重副轻农”，甚至“弃农从副”、“弃农经商”的情况。

俗话说“谷贱伤农”，最终导致农民无心种田，粮食不够吃，天下就不太平。同样，“教贱伤师”、“科贱伤科”，不从宏观调控上尽快扭转人才市场、科技市场和教学劳务市场上的不等价情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喊得再响，也难以阻挡国家一步一步地滑向愚昧无知、人才匮乏的危险境地。而这正是广大师生员工对当前高教改革，特别是校内管理改革深为忧虑之处。

“三个不等价”对高校的误导，并非不可克服。就学费来说，不妨彻底放开，按教学成本，一步提价到位，同时由企事业单位和政府在学校中设置高额奖学金和贷学金；就鼓励企业购买高校的科技成果来说，政府应允许企业从销售额中提留较高比例的技改资金，并对技改得益减免税收；就增加国家高教和高技术研究拨款来讲，也并非山穷水尽。建三峡，办奥运，耗资再大还不是有钱，且不论歌星们轻歌一曲，动辄万金。体育上的奥运固然显示民气；智力上、科技上的奥运更加增益国力。只要高层领导对高等教育和高科技真正重视，较大幅度地增加高教拨款和高科技研究基金，保护高校办学不受市场的误导，总归是有办法的。（责任编辑 蔡德诚）

（上接第58页）

碍任何垂直于（铜—氧原子）平面（C—轴）的导电性。安德森说，导致高的转变温度，实质上是C—轴的导电性的恢复。计算表明，只有“电子对”才能穿过两个（铜—氧原子）平面之间的势垒，单一的电子则不可能。在超导状态下，铜氧化物变成为三维金属，成对的电子可穿过这种金属“旅行”。

但有几位研究人员认为安德森的某些见解需要修正，因为安德森的计算仅在一维状况下才是完全可解的。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贝尔实验室的理论家钱德·M·瓦马说，“二维和三维系统并未证实和一维系统的行为相类似”，但他倾向于赞同安德森的基本概念，指出铜氧化物像一种临界费米流体。

MIT的研究人员李(Lee)则利用量子力学计算了安德森的基本理论，他得到的公式称为t—J模型（其中t表示电子的动能，J表示自旋的电子间的相互作用）。这个模型实际不是说为什么（超导）转变温度是如此之高，而是说转变温度为什么是如此之低。t—J模型指出，超导性是受振动或电子运动变化的抑制。

总之，目前有关陶瓷高温超导的理论就像人的性格那么多钟多样。似乎人人都可以找到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怀疑别人的理论，但都缺少关键性的资料数据。

安德森的模型可能也不太成功，如在自旋外壳中的电子实际上可能相互排斥；而瓦马的理论也没有精密地阐明偶合现象；而按t—J模型计算，要得出正确答案则需要某些近似值。总之，不管哪种理论都不完美。

普林斯顿大学的N·菲恩·翁格倾向于安德森，他认为大量实验似乎证实了安德森的说法。证据之一是奥塞克大学发现一种钙和镧基铜氧化物似乎具有接近160K的临界转变温度。这是目前最高的临界转变温度。如果这个实验得到确证，那么这一发现和安德森的计算是一致的。

钙和镧基铜氧化合物给人以启示，即超导理论可能是带预言性的——它从标准的BCS模型迈出了一大步，因BCS模型只是叙述性的理论。

翁格说，假定超导机理和安德森所说的一样，那么就有可能找到有最大量的邻接铜氧层及层和层之间联系最紧密的化合物。换句话说，当所有的铜氧层都相同并有同样的间隔时，就可能产生最高的超导（临界）转变温度。

一种成功的理论可以为开发新的超导体指明方向。因此，有关陶瓷高温超导理论的研究一直受到超导物理学家的重视。（刘先曙 编译）